

抗日战争

★全景纪录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伟大历史

抗日战争

十四年全纪录

下册

李 蓉 叶成林◎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全景纪录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伟大历史

抗日战争

十四年全纪录

下册

李 蓉 叶成林◎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江南北：抗日战争十四年全纪录 / 李蓉，叶成林著. —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5

ISBN 978-7-5115-3211-4

I. ①大… II. ①李… ②叶… III. ①抗日战争—史料 IV. ①K26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91793 号

书 名：大江南北：抗日战争十四年全纪录

著 者：李 蓉 叶成林

出 版 人：董 伟

责任编辑：宋 娜

封面设计：可圈可点工作室

出版发行：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金台西路 2 号

邮政编码：100733

发行热线：(010) 65369527 65369509 65369510 65369846

邮购热线：(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010) 65369521

网 址：www.peopledaily.press.com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字 数：660 千字

印 张：42.75

版 次：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5-3211-4

总 定 价：88.00 元

第七章 进步：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向

1. 制止摩擦 维护合作 / 351
2.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的阐述 / 362
3. 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宪政运动 / 369
4. 应对皖南事变后的严重局势 / 379
5. 民盟：民主运动中形成的一支生力军 / 386

第八章 奋勇：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1. 法西斯在欧洲和太平洋肆虐猖狂 / 395
2. 中国是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 / 403
3. 浙赣—长沙—中条山：一条不稳固的防线 / 411
4. “三光”磨励着敌后根据地军民的斗争 / 421
5. 积极参加对日抗战的少数民族 / 436

第九章 困境：春天来临前的严冬

1. 渡难关：根据地开展大生产和整风运动 / 446
2. 大后方文化界推动民主运动 / 458
3. 重庆的经济文化在困境和废墟中重建 / 467

4. 潜流涌动：沦陷区人民的抗日斗争 / 477

5. 日本反战士兵的反战活动 / 484

第十章 转机：看得见的胜利曙光

1. 战略转折终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来临 / 490

2. 补给线，生命线：缅北、滇西反攻之战 / 498

3. 鄂西战役和常德会战 / 506

4. 日军的“一号作战”，打通了大陆交通线 / 511

5. 八路军向河南沦陷区挺进 / 519

6. “扫荡”、“蚕食”、“清乡”，抗日根据地勇渡难关 / 524

第十一章 民主：民族团结与胜利的基本条件

1. 法西斯主义，被人民唾弃的主张 / 537

2. 宪政运动经历波谷之后第二次兴起 / 543

3. 民主联合政府：中共提出新主张 / 556

4. 大浪滚滚，大后方民主运动更加高涨 / 565

第十二章 反攻：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1. 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 577

2. “地下军”在沦陷区开始活跃 / 587

3. 决定中国未来发展的三个大会 / 592

4. 围绕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展开的国共谈判 / 604

第十三章 胜利：中华民族 14 年抗日战争的辉煌结局

1. 出席联合国旧金山大会 / 614

2. 波茨坦公告勒令日本无条件投降 / 621

3. 9月3日，中华民族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 / 644
4. 结束了战争和未了结的“遗留问题” / 650
5. 面向未来，为和平崛起回首抗日战争 / 661

后 记 / 665

第七章

进步：抗战时期中国政治的基本走向

1939年秋季以后，国际形势和国内政局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各帝国主义之间争夺势力范围矛盾的恶性发展，终于爆发了欧洲战争。此时，英法政府因全力对付欧洲战局而意图在远东对日实现妥协。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南进”或“北进”战略，则急于结束中日战争，一面以软硬兼施手法，诱重庆政府投降，一面积极策划全国伪政权的成立。

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倾向明显增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和冲突也开始尖锐并凸现出来。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团结，争取抗战的胜利，中国共产党正确处理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实行又团结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克服了统一战线内部一次次地的分裂危机，维护了抗日大局，并争取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团结抗战。

1. 制止摩擦 维护合作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前，国共两党团结一致，共御外侮，全国人民为之振奋。此后，日本加紧政治诱降，国民政府内部出现微妙变化。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投敌，对国民党不少人士的对外抗战决心有所动摇。于是，国民党顽固派对内愈益限制和打击进步的抗日民主运动，反共倾向日益增长。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是其军事政治方针的变化的重要关节点。

国民党领袖蒋介石一直希望实现其“溶共”的企图。1938年12月6日

晚，蒋介石在南岳召开军事会议后飞抵桂林，正好周恩来在此指导桂林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当天，蒋介石约见周恩来，正式提出把共产党吸收到国民党内。蒋介石说：“共产党跨党，大家不赞成，共产党既信三民主义，最好与国民党合成一个组织，力量可以加倍发展。如果同意，在西安召开华北西北将领会议后，就约毛泽东面谈。如果共产党全体加入做不到，可否以一部分加入国民党，而不跨党？”

周恩来当即回绝说：共产党实行三民主义，不仅因为这是抗战的出路，而且因为这是达到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国民党员则不都如此想，所以时机未到，可以采取其他办法。周恩来说：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而退出共产党，这不可能也做不到。少数人退出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不仅是失节、失信仰，于国家有害无益。周恩来的回答，使蒋介石大失所望。他表示，如果考虑合并事不可能，就不必约毛泽东到西安会谈^①。

12月8日，蒋介石飞抵重庆。12日，蒋介石接见参加国民参政会的中共代表王明、博古、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时，拒绝了中共提出的用跨党的办法处理国共两党合作关系的建议，并声称：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取消名义，整个加入国民党，我都欢迎。我的责任就是要将两党合成一个组织。过去，我打你们也是为“保存共产党革命分子合于国民党”，“此目的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这个根本不解决，一切均无意义”，“所以，我这个意见至死也不变的”。

蒋介石还对吴玉章说：“你是老同盟会，国民党的老前辈，还是回到国民党来吧！”吴玉章回答：“我相信共产党是相信马列主义社会科学的真理，深知只有共产主义才是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不能动摇。如果二三其德，毫无气节，你也会看不起吧！”^②还说：“现在世界上固然有一个党的强国，如苏联的布尔会维克和德国的纳粹，但也有各党并存的强国，如英、美、法等国。”蒋介石抢过话头：“他党可以并存，共产党不能并存。”“如不取消共产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6—437页。

^② 中共四川省委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吴玉章年谱》，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9页。

党，我死不瞑目。”^①这次谈话历时五六个小时，中共代表坚决拒绝了合并共产党的主张。

1939年1月19日晚，蒋介石约见周恩来，询问共产党对国民党即将举行的五届五中全会有无意见，并再提统一两党事。周恩来回答：两党统一不可能，希望解决各地反共捉人事件。蒋介石则说：根本问题不解决，不仅敌人造谣，即下级也常不安定，会影响上级，并说汪精卫已出走，更是两党团结的好机会。1月20日，蒋介石再次约见周恩来，重提国共两党合并一事。周恩来回答：此事不可能。蒋介石仍不甘心，要周恩来再电延安。蒋介石企图通过合并两党、取消共产党的计划被严辞拒绝后，便开始筹划有计划有领导的反共活动。

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此次会议虽然申言“坚持抗战到底”，但对日妥协空气很浓。蒋介石解释说：“抗战到底”，就是恢复七七事变前的原状。这离人民的要求相距甚远。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整理党务”，研究“如何与共产党作积极之斗争”。蒋介石在会上作《唤醒党魂、发扬党德、巩固党基》报告和《整理党务之要点》演讲。他说：“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们对中共不好象十五、十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他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会议根据蒋介石的演讲确定“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共方针。

会后，国民党中央颁发《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办法》、《陕甘两省防止异党活动联络办法》、《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沦陷区防范共产党活动办法草案》等一系列反共秘密文件。其《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密令各地：陕甘宁边区政府“实为分散力量妨碍抗战之最大障碍，绝对不能令其存在”。“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及冀中、冀南两主任公署与国家整个行政体制不合，应遵令撤销”，“十八集团军所设立之所谓晋察绥军区及其分区，应即撤销”。“共产党在各地不得假借名义，为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37页。

任何公开或秘密之组织及民众运动，如发现，即勒令解散，并予以应得之处分。”应严格“防范共党潜入活动，发展其秘密组织”。“共党应立即停止违反本党政策之各种宣传”，“发展本党党员，使每保或每甲皆有本党党员之公布，以示领导民众，防止共党活动之责”。可见，国民党对共产党的防范和限制，已经到了相当严密的程度。

5月1日，蒋介石主持国民精神总动员月，提出力行“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军事第一，胜利第一；意志集中，力量集中”三信条。7日，又称三民主义“是全世界拨乱致治的要道，我们国家起死回生必循的途径”。共产主义、民主主义“偏而不全”，只有他阐明的三民主义才可以“涵盖一切”^①。

鉴于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的退步所造成的国共关系的紧张状况，1939年1月24日、25日，中共中央分别发出致国民党总裁暨五中全会电和为国共关系致蒋介石电，重申坚持团结抗战方针，并指出磨擦现象最近尤甚，不应任其发展，致陷国家民族于不利。1月25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提出目前国共两党关系非亟加改善不能减少磨擦贯彻合作到底。要求五届五中全会中对国共关系和合作前途确定一个基本的认识。目前为了解决具体纠纷，可先由两党中央各派若干人同往各地视察，能就地解决者解决之，不能解决者，来国民党中央商讨。但国民党并未积极响应。

广大爱国民主人士对国民党顽固派政治上的表现很不满意。陶行知指出：“在抗战处于困难的现阶段，精诚团结应成为一个更重要的课题。但有少数人还不懂这是国家民族存亡的关键。因此抗战已两年多了，还有人喊着反共或排除异己。要知道反共是世界侵略者的口号，是敌寇惯喊的口号，同时也是汪逆叛徒正在用的口号。在我们则精诚团结，和衷共济，应是救中国的最紧要的口号，所以现在应特别强调精诚团结，打碎敌寇和汪逆分裂我们的阴谋进攻！”^②

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开始不断地制造磨擦事件，袭击共产党领导

①（台）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先“总统”蒋公全集编纂委员会编辑：《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0页。

②《新华日报》1939年9月10日。

的抗日力量。他们一方面攻击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游而不击”、搞“封建割据”，一方面置日军的进攻于不顾，抽调大批兵力包围、封锁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频频发起军事进攻。仅1938年12月到1939年10月，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制造的磨擦事件就达150多起，其中军事进攻28起。在华北、华中，也有不少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战士被国民党扣押、杀害。

国民党顽固派还在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的招牌下，对人民实行严格的**思想控制。1939年3月，蒋介石制作了一张“三民主义之体系及其实行程序表”，其内容包括原理、主义、原动力、方略、国民革命程序、目的等6个部分。蒋介石认为：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是“民生哲学”；天下为公是孙中山思想的“极”；三民主义的本身是“情、法、理”的体现，“民族主义本乎情，民权主义本乎法，民生主义本乎理”；所谓原动力，蒋介石认为是“诚”，具体来说是“智、仁、勇”；关于方略，蒋介石突出一个“党”字，即“以党治国”；关于建国程序，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但当时应以军政时期为本，同时加紧训政时期工作。实际上，蒋介石是摘取了三民主义的某些词句以障人耳目，骨子里却抛弃了孙中山的革命精神。蒋介石把经过他篡改的三民主义当作最“完满无缺的革命建国的最高指导原则”。在他眼里，民主主义、共产主义都有缺点，而且内容也不完备。只有三民主义博大精深，能涵盖一切。蒋介石认定，只要按照他的“体系”去“切实研究三民主义”，按照他的“程序”“努力奉行三民主义”，就可以战胜敌人，也就可以立即建设一个新中国^①。蒋介石提出全国实行国民精神总动员的主要目的，是想把全国的思想都统一到**他鼓吹的“三民主义”上去。

国民党实行的是文化专制主义的统治。抗战伊始，国民党曾作出一些进步姿态，对抗日言论的宣传比较放松。但随着国民党一党专政论的甚嚣尘上，对文化事业的控制也愈加严密。1939年2月，国民党规定：除国民党机关出版物以外，一切图书杂志均需于出版前将原稿送交国民党中央图书审查委员

^①（台）中国文化大学、中华学术院先“总统”蒋公全集编纂委员会编辑：《先“总统”蒋公全集》第1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1278页。

会及各地同类审查机关审查。采取这一措施的目的是阻止主张抗日、民主的进步图书报刊的出版和发行。

在日益加剧的反共磨擦面前，中共中央的态度是坚持团结抗战，正确对待磨擦。方针是：一不能逆来顺受，听之任之，置之不理；二要采取反击的立场又是攻势防御性的立场。1939年1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对《关于我党对国民党防共限共对策的指示》，提出：“我们对磨擦如逆来顺受，则将来磨擦逆流必更大，顽固气焰必更高，故我应以冷静而严正之态度对之。”针对国民党不准八路军干预政治和筹款、筹粮等等，中共中央公开表示：“抗战部队与游击队不能不吃，如能加饷，可考虑改变筹粮办法。已建立之政权未到万不得已时，决不应轻易放弃。”5月又指出：“对顽固分子斗争我之基本立场是攻势防御性的，取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态度，以站稳自己对内对外的立场，有时亦可于对方犯我时以先发制人的手段打击之，但必须极端慎重地采用这种手段。”

为进一步制止磨擦，中共中央于纪念抗战两周年纪念日致信国民党中央，驳斥所谓“有党即有磨擦”、“有党即有发展”、“党有武力，必生对立”等等反共理论。中共认为，反共是投降的前奏，国内外一定要严重关注中国的时局。在这封信中，中共提出：“坚持坚持抗战到底，反对中途妥协”，“坚持全国团结，反对内部分裂”，“力求进步，反对向后倒退”。毛泽东于当年9月又进一步概括为著名的三大政治口号即：“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①

中国共产党为团结一致对外，努力争取国共关系的好转。1939年9月10日，毛泽东到陕甘宁边区政府招待处拜访昨日率全国慰劳总会北路慰劳团到达延安的南北总团长张继、北路团长贺衷寒等，并设宴招待。晚上，又陪同到中央大礼堂出席延安各界举行的欢迎会，出席欢迎大会的有1000多人。毛泽东致欢迎词：团结抗战已经两年了，两年前没有抗战，没有团结，现在是团结抗战了，这是新现象、新光景，是堪以欣慰的。可是在两年的抗战中，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464、第611页。

国共两党之间有些小冲突、小磨擦，因此国共两党中间的同志，他们关切挂念着，在社会上一般人士中间也非常关切着。

毛泽东指出：抗战两年来，两党是以团结为中心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抗战两年后的问题了，但基本方针没有变，这就是“团结”二字。现在两党中间，在部分地方，有部分人员，发生一些磨擦，这种现象是不好的，但大家知道，在大局上，全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下，我们团结抗战是靠得住的。团结是总方针，除了团结没有别的方针，团结就是要团结在进步的基础上。毛泽东接着说：我们要站定自己的立场，绝不能与敌人的口号混同起来。我们的口号要处处与敌人对立。

全国慰劳总会慰劳团总团长张继接着讲话。他非常激动，谈到“民国十三年反对国共合作的人中间有我，并且我是第一个”的时候，他捶胸顿足，老泪纵横，连说：“我是罪人，我有罪！”他说：“今天情形变了，国共两党正常亲密团结着，我以为今日国共两党虽然有小磨擦，但是这些磨擦是通过和平方法可以解决的。现在大家没有不同意打日本的事情，我中华民族黄帝子孙绝不会再用兵打自己了。”毛泽东为张继的发言和自我检讨热烈鼓掌。

9月16日，毛泽东在边区政府交际处接见国民党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的刘尊棋、耿坚白、张西洛3位记者时，就国共关系等问题发表了公开谈话。关于所谓“限制异党”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已经提出抗议。”“还在七月间，我们党的代表周恩来同志，已经写信给蒋委员长。八月一日，延安各界又打电报给蒋委员长和国民政府，要求取消那个秘密流行成为各个磨擦根源的所谓《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但国民党方面“没有答复”，“听说这个东西，国民党里面也有一些人不赞成”。

毛泽东对记者们谈到：“你们知道，共同抗日的军队叫做友军，不叫做‘异军’，那么，共同抗日的党派就是友党，不是‘异党’。抗战中间有许多党派，党派的力量有大小，但是大家同在抗战，完全应该互相团结，而决不应该互相‘限制’。什么是异党，日本走狗汪精卫的汉奸党是异党，因为它和抗日党派在政治上没有丝毫共同之点，这样的党，就应该限制。”毛泽东还说：“我可以直率地告诉你们，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

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么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个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也是国民党顽固派的一个眼中钉。国民党顽固派调集胡宗南、朱绍良等部的30万兵力，从南、西、北三面包围陕甘宁边区，袭击八路军驻军，摧毁地方政权和群众团体，捕杀工作人员。1939年4月，胡宗南纠集镇原等县保安部队，进攻镇原、宁县八路军。5月，又袭击枸邑县的八路军残废军人医院，杀害伤残人员10余名，并占领枸邑城。12月，胡宗南部第97师3000余人，袭击八路军驻宁县、镇原的第770团，杀伤干部战士300余人，夺占宁县、镇原两城。

中国共产党为维护民族团结，集中力量挽救民族危难，对国民党顽固派的进攻采取了十分克制的态度。1939年12月下旬，八路军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致电蒋介石，呼吁停止进攻边区，恢复团结，勿使事态扩大。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怀也通电全国，反对枪口对内。同时，为着抗日的大局，为着保卫人民的利益，对反共磨擦绝不纵容。本着“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陇东地区军民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展开反击，打击了顽固势力，恢复了陇东大部地区。

对于国民党省保安司令张荫梧部队与中共抗日部队的军事磨擦事件，周恩来于1939年7月2日致电在前线的朱德等人，请他们务必将张荫梧进攻冀中的实情详报蒋介石、何应钦等人，并说明不得已自卫之原因，以证明责任不在我们。同时还要严防国民党因张受损失后对我加紧进攻。7月5日，周恩来致电程潜，说明河北深县、冀县发生的不幸事件，确实是由于张荫梧部包围在深县刘家庄八路军吕正操部引起，以致发生激战。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已致电河北省政府主席鹿钟麟派人彻底查清真相以便处理，请鹿迅速派人前去调查，并命令部下勿再故意滋生是非，使事态扩大。8月2日，周恩来收到陈诚表示抗议的来电后即复电于他，叙述事件经过，指出事件发生后八路军即要求派人调查事实真相，并呈报蒋介石。现鹿钟麟既不派人调查，又偏听一面之词，并通电各方混淆视听。张荫梧秘密杀害中共党员的确凿证据已被八路军吕正操部缴获。其后，八路军发起反击，全歼张荫梧所部。蒋介石

石不得不于9月19日下令“着张荫梧停职查办”。

1939年12月，阎锡山部发动了以消灭晋西南新军为主要目标的十二月事变。为了争取阎锡山继续抗日，中共中央在十二月事变后进行了“合好”工作。1940年1月，八路军留守处主任萧劲光致电阎锡山，指出旧军在晋西南和晋东南的恶行，已激起八路军和根据地人民的深刻不安，但八路军仍愿意继续团结在“阎领导下抗战”，如阎锡山愿意谈判，则准备派人去谈。与此同时，新军领导人薄一波及各牺盟会等都纷纷致电阎锡山，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问题。

2月25日，中共中央派萧劲光、王若飞到山西省宜川县的秋林镇面见阎锡山，送交毛泽东的亲笔信，阐明共产党关于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的主张。随后进行谈判，提出：双方停止军事活动，停止政治攻击；新军继续拥护阎锡山，不受某方改编；双方互不处罚，互不侵犯；今后统一于进步，实现阎锡山十大纲领；恢复与新军的电讯联系及人员来往等。阎锡山表示今后应注意以进步求团结，并说他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他之存在是于团结有利的。经过谈判决定：晋西南为阎锡山军活动区，晋西北为八路军活动区，在晋东南，以临汾至屯留公路为界，八路军及新军不向路南发展。

谈判结束后，阎锡山于2月28日给毛泽东回信一封，表示愿意继续团结一致对外。临行前，萧劲光和王若飞重申了中共“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方针。阎锡山说：这16个字的前8个是可以接受的，但后面的8个字似乎太强硬了，请二位回延安后禀告毛泽东先生，可否改为“人若犯我，我必自卫”。至此，经过斗争和统战工作，十二月事变基本得到了解决。

朱怀冰、石友三率部在冀南地区制造摩擦，八路军被迫于1940年2、3月间发起冀南战役和卫东战役，将朱怀冰、石友三的军部及其两个主力师的大部、还有其他反共武装共万余人歼灭，巩固了鲁西、太行、冀南、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

战役结束后，为团结抗战，中共中央及时命令八路军停止对朱怀冰的追击，并提出休战。3月16日，毛泽东电示彭德怀：“军事上必须立刻刹住，转为守势，彼军进迫，我军后退，一枪不打。”“如彼再三再四进迫不已，然

后我加以还击，其曲在彼。”^①接着，中共中央派朱德到洛阳，同第1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卫立煌历来对反共磨擦持消极态度，但在蒋介石的压力下，不得不虚张声势，亲自从洛阳到晋南召开军事会议，传达蒋介石的命令，部署向八路军的进攻，同时指示嫡系部队按兵不动，消极应付蒋介石。他还私下派人送信给朱德，希望八路军作出适当让步，以免事态扩大，并派代表邀请朱德到晋城商谈。

4月12日，中共中央电告朱德，希望他能和卫立煌进行和平协商，解决作战区域划分等有关问题。于是两人在晋城见面。久别重逢，两人都很高兴，谈判也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朱德表示了中共同友军长期抗战的真诚愿意，卫立煌表示两军的磨擦只会有利于日寇，必须终止。双方协定重新划分防区。这次会谈，使紧张的国共关系逐渐缓和。一场剑拔弩张的战争像一阵乌云被和风吹散。

中共中央于1940年5月4日指示东南局，要敢于冲破国民党顽固派的无理限制，放手发动群众，向一切敌人占领区域发展，独立自主地扩大军队，建立抗日政权。以陈毅为首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迅速传达中央指示，决心放手打开局面，向苏北发展。6月，新四军江南指挥部率领第2团、新6团等部准备经溧阳、武进路向长江边北移。第3战区第2游击区冷欣以其第40师主力一部及“挺进军”第5团等部对新四军突袭。新四军奋起自卫反击，歼其两个团于西塔山地区，余部溃逃。新四军随即越过公路、运河、铁路、长江等几道日军封锁线，于7月8日前胜利到达苏北吴家桥地区，同挺进纵队、苏皖支队会合。

在苏北，除了韩德勤部，还有泰州地方实力派、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李长江和属宋子文系统的税警总队陈泰运部。6月底，泰州李明扬、李长江（简称二李）受韩德勤唆使，攻击郭村一带的新四军挺进纵队，新四军奋起自卫。为打开苏北抗战局面，扩大统一战线，指挥部研究确定了联李、击日、反韩的策略方针。7月3日，陈毅到达郭村，亲自出面与二李联系，重申团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76页。

结抗日主张，让出郭村，释放俘虏，归还枪支。二李表示感谢，并同新四军恢复原已初步建立的合作关系。

7月下旬，北渡长江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改称苏北指挥部，仍由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栗裕任副司令。部队整编为3个纵队9个团。第1纵队由叶飞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2纵队以王必成为司令员、刘培善为政治委员；第3纵队以陶勇为司令员，刘先胜为政治委员，共7000余人。苏北指挥部提出团结、抗战、反顽口号，要求全体指战员做好打运动战、歼灭战的充分准备，严格执行纪律，宣传党的政策，开展群众工作。7月25日，新四军东进，直指黄桥。

10月黄桥一战，新四军共消灭顽军第89军军部主力12个团共1.1万人，缴获长短枪3900支，轻重机枪189挺，山炮3门、迫击炮59门，还有大量弹药和军需物资。韩德勤看见大势已去，便率残部千余人逃往兴化。新四军追到东台停止追击，给韩德勤留了一条生路。黄桥战役胜利后，新四军派出一支部队，继续沿通榆公路北进，准备迎接南下的八路军。

1940年10月10日，新四军苏北部队和黄克诚领导人南下八路军先头部队会师于东台县的白驹镇。关于黄桥战役中大批俘虏的处理，毛泽东10月12日致陈毅电指出：俘虏兵只释放少数坏分子。其余一概补充自己，加以训练，增强部队战斗力。下级军官也应留一部队稍带革命精神的，其余的不论如何反动，一概不杀，加以优待和释放。10月16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优待俘虏问题。会上决定对反共俘虏一律不杀，也不要他们自首，而应加优待。据此精神，毛泽东于18日起草了对待反共俘虏的指示。对分化瓦解反共力量起了积极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战线上也进行了斗争。针对所谓“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一切革命都包括在三民主义之中”的叫嚣，为了解除全国人民的疑虑、回答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毛泽东于1940年1月9日在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讲演，后经补充、修改，发表于2月15日的《中国文化》创刊号上，20日在《解放》周刊发表，标题改为《新民主主义论》。此文系统地回答了中国将向何处去，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是什么，怎样争